

更不能運用情感的結果，例如不用熱愛或憤恨造成的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對話各方都不能以自己的聖經或啟示為論據，凡涉及自己獨有的、排他的信理，都要將之當作討論的題目，圍繞着同一題目，各述各的理，直到一種信理被全體接受為止。魯爾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宗教對話的、可能達到的理想狀態，首先因為，雖然救贖史具有獨一性，但是救贖史並不排斥異樣的聲音，也不偏愛某一個宗教；並且因為，理性及理性範疇內的豐富而廣闊的倫理訴求，能夠使擁有不同文化的人們改變、放棄或重新定義他們的信仰，儘管他們的信仰是與生俱來的，或者是通過教育和習慣而根深蒂固的；最後因為，各種宗教信奉的是同一個造物主，同一種律法，朝向同一個救贖的目標。魯爾堅信，通過宗教對話可以實現人類的信仰同一。

在《異教徒與三智者》中，魯爾讓每一種宗教的「智者」出場，讓他們自由地、沒有障礙地闡述自己的信仰教理，同時，讓異教徒中的「智者」提問，使各種宗教不被對方理解和接受的信條教義得到強調和突顯。在魯爾的筆下，宗教對話的過程就是尋求真理、探究真理的過程，自始至終，他不僅沒有給予某種教義以對或錯的結論，也沒有給予哪種宗教以優或劣的判斷。

三、《異教徒與三智者》的主要內容

《異教徒與三智者》是拉蒙·魯爾最全面地闡述其宗教對話思想的著作。¹⁵其中描述一位不信神的哲學家在

15. 拉蒙·魯爾共有六部著作以不同信仰者相互之間對話的形式寫成。除了這本《異教徒與三智者》以外，其他五部如下：《聖靈論》(*Liber de Sancto Spiritu*, 1273-1275) 是一位拉丁學者與一位希臘學者之間的對話錄，他們當着一位穆斯林的面討論信仰的教條問題；《韃靼人與基督徒》(*Liber Tartari et*

思考死亡問題的時候陷入精神危機，因此懷着極大的絕望離開故鄉，想通過觀賞和享受自然美景來緩解心中的絕望。

與此同時，有三位智者（學者），其中一位是猶太人，一位基督徒，還有一位是穆斯林，不期而遇，結伴來到一處小樹林，在山泉邊上坐下，計畫討論一下信仰問題。這時來了一位「智慧女子」。她向他們介紹了山泉邊上的五棵樹的含意和樹上花葉的內容。

「智慧女子」解釋說，第一棵樹有二十一片花葉，上面寫着上帝的七個美德（屬性）；七個屬性交叉搭配，每一片花葉上寫有兩個。第二棵樹有四十九片花葉，每一片上有一個上帝美德和一個人類美德。第三棵樹也有四十九片花葉，每一片上有一個上帝美德和一個人類罪惡。第四棵樹有二十一片花葉，每一片上寫着人類七個美德中的兩個。第五棵樹又有四十九片花葉，每一片上有一個人類美德和一個人類罪惡。每一棵樹的全部花葉都有兩個前提：一、上帝必然擁有人類可以理解的最大尊榮和最大完善；上帝的諸屬性相互同等，相互和諧，絕無對立；二、被造的美德和非造的美德互不對立，但美德與罪惡絕不相符。借助這些花葉可以安慰不幸，減輕痛苦和達到永遠的和平。

Christiani, 1282-1285) 是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三人之間的對話，在場的是一位尚不信神的韃靼人；在《信神的人與不信神的人之間的論爭》

(*Disputatio fidelis et infidelis*, 1287-1289) 中，魯爾以一位信神的首領身份向另一位不信神的人解釋世界創造的目的通過基督道成肉身等展示出來；《有關五智者的書》(*Liber de quinque sapientibus*, 1294) 是五個人的對話，他們是拉丁學者、希臘學者、基督教徒荷馬的論爭》(*Disputatio Raimundi christiani et Homeri Saraceni*, 1308) 中，魯爾與一位伊斯蘭教學者進行爭論，用阿拉語寫成。參見Platzek，《拉蒙·魯爾：生平、著作與思想基礎》，下冊。

「智慧女子」離開後，三位智者商議借用這五棵古樹及其花葉，運用女子提示的方法討論各自的宗教，找出真正的信仰，以使世界各族能夠和睦相處。此時，正好那位異教徒，即那位不信神的哲學家來到山泉邊，便加入了三智者的討論。異教徒發現這三個人各有各的信理，都認為自己的信仰正確，他人的信仰錯誤。於是，異教徒提議，三位智者分別講講自己的信條，他將根據他們的講解來為自己選擇一種宗教。

接下來，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別講述了自己信仰的宗教信理或信條。這是全書的主體部分。

然而，在三門宗教的智者闡述了自己的信仰教理之後，書中並沒有說明那位異教徒最終選擇了哪一門。對此，魯爾特別通過某一位智者說：「對於我們來說，現在有這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即你會選擇哪一個宗教，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的理性力量，也需要我們的思想能力。如果你要當着我們的面宣告你所選擇的宗教，那麼我們就會失去一個討論的好題目，並且失去一個尋求真理的好機會。」¹⁶

在全書結束之前，三位智者達成協議：將這樣的宗教對話持續下去，直到認識共同的真理。

可以確切地說，雖然《異教徒與三智者》的寫作目的是宣佈「基督教是真宗教」，希望走在「錯誤」道路上的異教徒走上正路，但是，這不是一部基督教的護教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三大宗教的智者都同樣地運用魯爾的「技藝」，同樣地運用五棵樹上的花葉，或說，同樣地運用一部邏輯機械來論證自己的宗教。特別是，宗

16. 見本書，頁 236。

教對話的結局是懸置的，沒有結論；宗教對話的目標是長久地、自由地相互接近。

四、歷史影響

拉蒙·魯爾在世時就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的「技藝」在巴黎和蒙彼利埃等大學城的年輕學者那裏得到贊同和追捧，另一方面，他的宗教對話思想不合當時的教會正統觀念，並且他用加泰羅尼亞方言寫作和講道也與當時的社會主流相悖，因而不被學術界上層所接受。

魯爾去世以後，阿拉貢著名的宗教審判官艾默里庫斯 (Eymericus, 1320-1399) 將他定為思想不着邊際的「幻想者」，說他「幻想」能夠與異教徒和睦相處，「幻想」人能夠通過理性理解神聖的奧秘。雖然艾默里庫斯沒有將魯爾定為異端，但是他於一三七六年列舉了魯爾的所謂「百條謬誤」，差不多將魯爾置於敵對者的行列。稍後，巴黎大學校長格爾遜 (Johannes Gerson, 1363-1429) 於一四一九年公開譴責魯爾的觀點，極力抵抗他的思想在學校內傳播。甚至魯爾的擁護者、德國哲學家庫薩的尼古拉也在著述中儘量避免出現拉蒙·魯爾的名字，儘管他深受魯爾的啟發。宗教改革運動展開以後，魯爾的著作被列在羅馬教宗開列的禁書目錄之中；艾默里庫斯對魯爾的評判也多次印刷出版，將教會對魯爾思想的定性廣而告之。當時著名的經院哲學家，如蘇亞雷斯 (Francisco Suárez, 1548-1617) 等人也都將魯爾的學說打進「謬誤」的行列。直到近代晚期，在西方學術界仍然有對魯爾的批評之聲。例如德國哲學家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1838-1917)，他特別強調，魯爾想讓理性的權

威高於教會的權威，對基督教會造成顛覆性威脅。¹⁷

當然，對魯爾的否定和譴責只是一方面，並且突出在他的宗教對話思想方面。另一方面，迄文藝復興以降，對魯爾的支持和贊同聲越來越高，特別對於他的「技藝」理論出現越來越多的肯定性發展。

在廣泛收集古典著作的文藝復興早期，典型的例子如前面提到的庫薩的尼古拉。他不僅收集了魯爾的各種著述和手稿，而且還有一部魯爾著述摘要。庫薩深入地探究魯爾的「技藝」及其組合形式，其《論假設》（*De Coniecturis*, c. 1442）明顯地帶有魯爾的思想痕跡。另外，庫薩對魯爾的宗教對話思想也懷有深切的同感。在《論信仰自由》（*De Pace Fidei*, 1453）中，庫薩像魯爾一樣，使不同信仰的代言人在一次聚會中商討共同的信條，表達宗教信仰多元的觀念。¹⁸在文藝復興後期，支持魯爾的典型例子如當時非常有影響的德國宗教哲學家奈特斯海姆的阿格里帕（Agrippa von Nettesheim, 1486-1535）。阿格里派特別推崇魯爾的「技藝」，認為這是藝術中的藝術，是能夠解決許多長久以來沒有解決的思想理論問題的有效工具；所有其他學科都可以參考這門「技藝」，不僅是一般的世俗學科，而且包括《聖經》研究。一六五一年，阿格里帕對於魯爾「技藝」評價的文章與意大

17. 關於對魯爾的批判與攻擊，參見Alois Madre，《針對拉蒙·魯爾的神學爭辯》（*Die theologische Polemik gegen Raimundus Lullus*; Münster: Aschendorff, 1973），散見各處。

18. 研究認為，庫薩·尼古拉的《論大公教會的協作》（*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 143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於二〇〇三年以《天主教的和諧》出版庫薩的這本書）直接受到魯爾組合技藝理論的啟發。參見Charles H. Lohr,〈庫薩的尼古拉摘錄拉蒙·魯爾著作言論集〉（*Die Exzerptsammlung des Nikolaus von Kues aus den Werken Ramon Lulls*），載《弗萊堡哲學與神學學刊》（*Freiburger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30 [1983]），頁40-64；關於庫薩的《論大公教會的協作》，見劉新利，《德意志歷史上的民族與宗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282-285。

利哲學家布魯諾的四篇評論一起在施特拉斯堡（Strasbourg）出版。¹⁹阿格里帕對魯爾的評價直接影響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前者將魯爾的「技藝」思想看作是一種無意識地關於人們尚無所知之事物的科學，後者對魯爾的「組合」理論進行了深入並系統的發展。在《探討組合的技藝》（*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 1666）中，萊布尼茨建設性地發揮了魯爾在《組合的技藝》（*Ars combinatoris*, c. 1274）中闡發的思想，論述了一種使不同學科聯合成為有機的、系統的知識百科全書的方法。²⁰

關於拉蒙·魯爾其人及其學術成就，漢語學術界迄今沒有專門的、較為系統的述評，遑論他的宗教對話思想。然而，如果我們將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具有廣泛影響的宗教對話思想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就會看到，早在約六百年以前，這些思想所涉及的主要論點都已經在魯爾的著作中出現。例如關於宗教對話的目標。美國學者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在其提出的十條「基礎規則」中認為，宗教對話的目標是「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他人」及「更充分地據此生活」。²¹中國學者何光滬認為，適宜的宗教對話目標是「和平相處，友好交往和有益世人」。²²拉蒙·魯爾認為，宗教對話是「相互

19. 參見Frances Amelia Yates《魯爾與布魯諾》（*Lull and Bruno: Collected Essays*; London/Boston: Routledge, 1982），卷一。

20. 參見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哲學著作：基礎哲學文集》（*Philosophische Werke: Hauptschriften zur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 1: BD 3/Teil 1; Hrsg. E. Cassirer;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6），卷一，第一部分。

21. 參見Leonard Swidler編，《朝向一種普遍的宗教神學》（*Toward a Universal Theology of Relig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8），頁14-16。

22. 參見何光滬，《關於宗教對話的理論思考》，載《浙江學刊》4 (2006)，頁53。

尊重，相互扶持，和諧一致，和睦相處」的最好方式。²³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又如關於宗教對話過程中的相互學習、平等、真誠、信任、解釋、批評以及世俗學術界作為獨立的一方參與宗教對話、使用彼此能夠接受和理解的語言等等方面，這些被當代學者視為公認規則或帶有創新性的系統理論，早在魯爾那裏就已經有了細緻的說明，並進行了實踐。比較之下，魯爾的另外兩個觀點還沒有得到現代學者的強調性認識，即「自由」參與對話和對話「過程」構成和平時期。在各大宗教團體都具有強烈的全球意識的今天，如何在宗教對話中體現「自由」，是不是宗教對話的「過程」就是宗教間和平相處的樣態，這兩個中世紀西班牙學者拉蒙·魯爾提出並嘗試解答的問題，應該也是當今漢語基督教學術界對之進行系統思考並給出答案的現實問題。

五、版本說明

拉蒙·魯爾的著作一般用加泰羅尼亞語撰寫，少數作品也用拉丁文和阿拉伯語寫作。最早結集出版的魯爾著作是拉丁文本，出版人是德國美因茲的出版商薩爾秦格（Ivo Salzinger, 1669-1728）。薩爾秦格廣泛地收集、整理和翻譯魯爾的手稿和已經出版的著作，於一七二一年至一七四二年連續出版了八卷《魯爾拉丁文集》

(Corpus Lullianus Latinum/ Beati R. L. doctoris illuminati et martyris opera; lateinisch, I-VI. IX-X, Mainz)。這是一套沒有落實原計劃的文集，其中只收集了魯爾全部兩百五十餘部著作的四十部，並且包含有膺品和印刷錯誤。雖然如此，這個版本是近代以來魯爾研究的主要資料。

23. 見本書，頁 239。

魯爾著作的加泰羅尼亞文本由馬略卡的魯爾研究者羅塞洛（Geronimo Rosselló）先後於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五九年在帕爾馬出版（*Obras de Ramón Lull, texto original publicado etc.* [Palma, 1837]; *Obras rimadas de Ramon Llull, escritas en idioma catalan-provenzal* [Palma, 1859]）。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帕爾馬的魯爾研究者陸續出版了加泰羅尼亞語的二十一卷本《拉蒙·魯爾文集》（Miquel Obrador & Salvador Galmés, *Obres de Ramon Llull*; Palma, 1906-1950），稍後又由巴賽隆納的加泰羅尼亞研究中心編輯出版了現代加泰羅尼亞語的兩卷本《魯爾文著精選》（Geronimo Rosselló [Hg.], *Obres essencials*; Barcelona: Editorial Selecta, 1957-1960）。與美因茲（Mainz）出版的拉丁文本一樣，魯爾著作的加泰羅尼亞語文集也是魯爾研究中的權威性版本。

英文本的《魯爾選集》（兩卷本）由巴賽隆納大學加泰羅尼亞研究中心主任波奈爾（Anthony Bonner）編輯出版（*Selected Works of Ramon Llull*; ed. & trans. Anthony Bonner, Volume 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至二〇〇九年底尚沒有德文本的魯爾文集。但是，在弗萊堡大學教授普拉采克（Erhard-Wolfram Platzeck）神父的《拉蒙·魯爾》（*Ramon Llull*; Berlin, 1962-1964）中列有一份幾乎可以說是完整的魯爾著作目錄，為魯爾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資訊。

《異教徒與三智者》的中文翻譯根據德國哲學與神學博士平德爾（Theodor Pindl）的德文本（Ramon Lull, *Das Buch vom Heiden und den drei Weisen;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Theodor Pindl*,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98）和波奈爾的英文本《魯爾選集》卷一，頁

110-304，個別地方參考薩爾秦格的《魯爾拉丁文集》卷二，
頁 1-94。德國凱澤斯勞騰大學 (Universität Kaiserslautern)
的桑薩諾碩士 (Jose Antonio Sanchez Sansano) 為中文譯
本提供了加泰羅尼亞語的翻譯幫助，在此致謝。